

鄧長風 著

明清戲曲家考略全編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鄧長風 著

明清戲曲家考略全編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明清戲曲家考略全編/鄧長風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5325-5324-2

I. 明… II. 鄧… III. ①劇作家—生平事迹—考證—中國—明清時代 ②古代戲曲—文學研究—中國—明清時代
IV. K825.78 I207.3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043259 號

明清戲曲家考略全編

(全二冊)

鄧長風 著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華書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 × 1168 1/32 印張 54.375 插頁 10 字數 1,284,000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300

ISBN 978-7-5325-5324-2

1 · 2101 定價: 118.00 元

出版說明

鄧長風，1944年11月出生於上海，祖籍湖北武漢。1961年高中時參軍入伍。1966年復員回上海後曾在格致中學、新風中學擔任教師。1981年考入上海古籍出版社任編輯。1982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函授）。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期間，鄧長風先生以高度的敬業精神編輯出版了不少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古典文學研究著作和廣受讀者歡迎的古典文學普及讀物；同時，他又虛心好學，從事古典文學，主要是古典戲曲的研究工作，編輯之餘，撰寫了不少研究論著。1990年他辭職赴美生活。在工餘之暇，他赴美國國會圖書館苦讀，其研究心得多以札記體文章出現，詳考明清戲曲家生平、著作之來龍去脈，資料詳備，考述縝密。此類文字，積年已逾百萬字，曾分別結集為《明清戲曲家考略》（1994年12月）、《明清戲曲家考略續編》（1997年1月）和《明清戲曲家考略三編》（1999年2月），由我社出版。所可嘆者，天不假年，正當他學術精進之時，却因患惡疾不治，於1999年3月在美國去世。為紀念鄧長風先生，我社接受其家屬托付，將其遺著與之前三部著作合并出版。

本書即為鄧長風先生的著作彙編。已出版之三部著作根據鄧長風先生生前所作的勘誤進行了修訂，此次首次付梓的遺著序為《明清戲曲家考略四編》，并總之以《明清戲曲家考略全編》之名。

遺著是作者首次構建一部整體著述的嘗試，但由於尚未完稿，文句簡略而結構稍嫌鬆散，今權衡再三，且以單篇文章排印，並剔其重出，定其次序，排其先後，分別歸納，闕題之文命之以題，以爲此書四編。所可用力者惟此。所不可用力者，鄧先生之精構初想，能够得其庶幾乎，或竟付之闕如乎？不到之處，不虞之誤，切望方家指教。

上海古籍出版社

序

1995年2月上旬，農曆正月初六，旅美數年的鄧長風先生第一次回國探親。他邀請上海的一批師友到陸萼庭先生家一聚，給我們贈送了他的第一本著作《明清戲曲家考略》。其時在座的有蔣星煜、陳多、夏寫時、唐葆祥諸先生。此書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於一個月前剛剛出版面世。那時出版學術著作是很困難的，所以諸位學人在摩挲著這一本精裝的大書時，都表現得特別興奮。

1997年2月上旬，農曆正月初三，長風再次回國探親，他邀約一批同仁到我家一聚。光臨的有胡忌、黃菊盛、李曉、趙山林、朱建明等先生。長風還給我介紹了他的弟弟周風先生。他給我們贈送了新作《明清戲曲家考略續編》，這也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於月前趕印出來的。時間僅僅過去兩年，長風就又獻出了這樣一份學術厚禮，這給那一個新春佳節增添了一份意外的驚喜。

1999年2月下旬，農曆正月初九，周風先生來訪，他帶來長風兄的新著《明清戲曲家考略三編》。他告訴我，長風在華盛頓臥病不起。這令我十分難過。翻書看版權頁，古籍出版社照樣是在農曆年前趕印成的。可惜長風未能回鄉過年。

過了個把月，我因事給陸萼庭先生掛電話，陸先生在電話裏告訴我一個驚人的消息：長風於本月8日在華盛頓去世。真是令人難以置信！他的新書還在我的手頭散發著油墨的清香，他卻如此匆匆地離開了我們。

長風與我同庚。他在學術生涯最為寶貴的時候被病魔奪走了生命。其才未盡，其志未展，現實竟是如此的殘酷無情，這不能不令吾輩扼腕慨惜。我想，長風經歷過許多苦難的日子，與許多同輩人一樣，因時世的關係虛耗了許多年華，故而特別珍惜難得的平和生活，不免過於用功勞累。我總覺得他除了坐冷板凳，已別無所好。可惜他遠在天涯，我們無法給他提供生活的各種樂趣。他的《考略》三卷，卷卷都是嘔心瀝血之作，他已經為戲曲文獻研究作出了功德無量的貢獻，這是他的血汗與生命的結晶。

長風的《考略》三卷，大部分文章是在華盛頓的國會圖書館裏寫成的。他注明為“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劄記”的有四十五篇，注明為“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清代珍本知見錄”的五篇，另有多篇文章的材料都與國會圖書館有關。他自己在《考略三編》的後記中曾有一番統計：“六年半來，即自1990年7月至今，我在國會圖書館度過了大約五百多個工作日，閱讀過的清人詩文別集、總集、叢書、族譜、年譜、雜著等，總數當在一千五百種以上。”所下的功夫如此之深，所研閱的歷史文獻如此之多，而且大多是難以經見的善本乃至天下孤本，這就保證了其文章的扎實的材料基礎和原創性。

記得1997年仲夏，我赴美參加耶魯大學舉辦的學術會議。長風邀請我順訪華盛頓。第一天他就帶我參觀國會圖書館的中文部。看他在圖書館的自如往來，與管理人員的親和相招，你就會覺得，他儼然成了這個圖書館大家庭中的一員。一位清瘦的先生帶我們在大書庫的書廊間走進走出，然後就特地開鎖讓我們進善本書庫觀賞。管理人員自豪地對我說，國會圖書館有中文藏書70萬冊，為全美第一。這裏真的是研究中國文化的福地，不要說別的，就憑那麼齊全的地方志，就令人羨慕不已。在

華盛頓的那幾天，長風還陪我參觀白宮、華盛頓紀念碑，還有那麼多的博物館。我們還一起到那座因發生“水門事件”而聞名於世的大廈，拜訪研究中國戲曲和中國電影的著名學者時鍾雯教授。

當然，我不問也清楚，整年累月坐在國會圖書館裏讀書，那是要付出極大的代價的。因為在美國，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打工賺錢，其生活的窘迫可想而知。所以，今年當我讀到他在《考略三編·校後記》中寫的“當我執迷於我所鍾情的領域、苦心經營著自己的三本論文集時，內子一直默默地支持著我”這句話時，別有一番感慨。想想看，長風一家以經受生活的貧困而獲取精神的富足，那是怎樣的一種境況。

但長風經過默默耕耘，涓滴積累，持續不斷地奉獻學術成果，終於成了一名有特殊貢獻的專家。陸尊庭先生稱讚長風的書是“通過辯訛、正名、定位，逐個解決問題的書”。因為長風考察的是“明清戲曲家”，重點又在清代戲曲家，而清代戲曲家“數量大、問題複雜、空白點多（大多生平不詳）”，故而需要通過資料的爬羅剔抉，逐個予以解決。所謂辯訛，是指對一些以訛傳訛而又習焉不察的問題加以辯正。所謂正名，是指考索戲曲家的本名、真名，以替代習稱的字、號等別名乃至假名。所謂定位，是指考索戲曲家的生卒年及生平行跡，按生卒先後為曲家排定次序（《考略續編·序》）。

長風的明清曲家考索，對於中國戲曲史研究的展開，其推進作用非同一般。上世紀八十年代，陳多老師在古籍中發現了兩篇明代的戲曲理論著作，一篇是祁彪佳的《孟子塞五種曲序》，另一篇是卓人月的《新西廂序》。我在寫作《中國戲劇學史稿》時及時介紹了這一新發現。卓人月這個人物引起我的極大興趣。由《新西廂序》中得悉，卓氏曾改寫王實甫的《西廂記》為

《新西廂》，其故事結局變喜劇為悲劇。此本《新西廂》未流傳，但作者自撰的序文卻流傳下來了。這篇《新西廂序》的確是中國文藝史上難得的有關“悲劇觀”的文章。但當時我未及讀過卓氏及其友人的一些文集，因而對卓人月的生平知之甚少。不久讀到了長風專論卓人月的論文，發表在《文學遺產》1992年第六期。他在國會圖書館讀到卓氏的《蕊淵集》及其好友徐士俊的《雁傳集》，由此考知卓人月的生卒年，獲悉有關卓氏的生平、交遊及著述的許多事蹟。為此，他對我在《史稿》中的論述有所充實與修正。他分析卓氏“獨特的生活經歷”和“獨特的家庭結構”，認為“卓人月正是一場現實家庭悲劇中的犧牲品”。這一結語真如醍醐灌頂，讓我驚歎數日。

《孟子塞五種曲序》的發現，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徐朔方先生首先著文認為此篇序曲只是《貞文記》傳奇的序，而不是“五種曲”的序，並認為孟稱舜的《貞文記》作于清順治十三年（1656）或以後，因而這篇序不可能是祁彪佳（1602—1645）所作，而只能是一篇偽託文章。長風為此一公案連續寫了三篇論文，對徐文提出質疑。在論述過程中，長風首先從清人平步青的文章中，考訂了孟稱舜的生卒年；同時還理清了“久保天隨藏本”《貞文記》的流轉路線，而最終請友人在臺灣找到了此一存世的最佳本。此一線索的提供，極便於海內學者的繼續考辨。

我從長風的研究成果中得益還有很多。如長風率先論證《笠閣批評舊戲目》的作者是吳震生。此一發現已為學界所認同。我在《史稿》再版中就依此而定名。又如《曲波園傳奇二種》，歷來都認為是明末杭州人徐士俊撰作，長風明確指出其誤傳的過程，考定其作者乃清初會稽人徐沁。十幾年前，我參加主編《中國曲學大辭典》，就專列條目《曲波園傳奇二種》，題為徐沁作。

回想起編纂《中國曲學大辭典》，有多少學者的動人事蹟令人永遠不能忘懷。我們當時聘請陸萼庭先生編撰清代戲曲家的一大目。陸萼庭先生提出的第一個合作者就是長風兄。長風《考略》三卷中細心考證過的許多有關清代戲曲家的材料，都在《大辭典》中有所揭櫫。陸先生與長風都說過，他們當時曾有許多書信往來，這是他們於大洋兩岸，共同探討許多有關清代曲家的學術疑難問題的見證。這種學術討論對於提高辭書釋文的學術品質是十分必要的。長風總是這樣，把辭書編撰工作看成是自己的責任。他還特地從國會圖書館的善本書庫中拍攝了兩幅書影提供給《大辭典》，一幅是明陳繼儒評本《玉杵記》，另一幅是清康熙刻本滿漢合璧《西廂記》。這兩幅極其珍貴的照片給《大辭典》增色不少。

長風之所以鏗而不捨地考索了幾百名清代曲家，就因為他志在編一本清代的曲家曲目書著。此事難度很大。長風就曾明確地指出，歷來的戲曲研究，大致是由元及明、及清，順勢而下，往往重點在元、明至於清初。清代戲曲，作為一個整體，未被重視，對它的研究也最為薄弱。而研究的深入與否，與戲曲作品的流傳狀況有很大關係。元明雜劇、明傳奇，都有不少總集、選集存在，還有大量近人的排印本，而清代的作品，僅有一小部分流傳稍廣。也正因為如此，對於戲曲書錄的編撰，清代自然就比元明兩代艱難得多。他為此思考有年，並且有了一些具體的想法，先後寫了《也談清代曲家曲目著錄的幾個問題》、《〈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簡評——兼談清代曲家曲目著錄的若干問題》和《戲曲文獻學的呼喚——試談清代雜劇傳奇總目的編纂構想》三篇論文。這三篇簡稱《也談》、《兼談》、《試談》的論文分別收入他的《考略》、《考略續編》和《考略三編》三本書中。他自己認為，這三篇文章“反映了幾年來我在編撰一部新的清代戲曲

書錄問題上的思考軌跡”(《考略三編·後記》)。

關於清代戲曲書錄問題，長風的思考主要有三：一是關於曲家生平考證的問題，二是清代曲家的分期問題，三是雜劇與傳奇的區分問題。對於這三個問題，他都有較成熟的看法。如對雜劇與傳奇的區分問題，他提出了一個標準：“可將雜劇與傳奇的分界線，劃在十與十二之間。”這一句簡單的話，卻是他對全部已知曲目的統計結果。他發現：六至八折的短劇，前人已確認歸於雜劇；十二折的曲目，多被視為短篇的傳奇；剩下的只有九至十一折的曲目了，而既成的事實是八、九、十相連，而十一折的曲目恰恰一本也沒有。有了這樣一個統一的標準後，長風就自己設問：“清代究竟有多少雜劇作家、多少傳奇作家？又有多少兼作雜劇、傳奇的作家？在兼作雜劇、傳奇的作家中，兩種體制的作品皆存的有多少、一存一佚的又有多少呢？”（《試談》）他設問的時間是在1996年12月份，而他在兩年後就弄清了這些基本資料。他製作的《清代戲曲家分期、作品存佚、體制一覽表》（見四編）給出了清晰的答案。他根據全部清人戲曲書錄及近人戲曲書錄，統計而得：雜劇作者211人（作品存者161，佚者50），傳奇作者586人（作品存者265，佚者321），雜劇、傳奇兼作者84人（作品存者79，其中兩存者58，存一者21；佚者5），總計881人（作品存者505，佚者376）。得出這些基本數字，其中甘苦，是不言而喻的。沒有“竭澤而漁”的勇氣，誰也無法作這樣的統計。

長風在分析了上述三大問題後，就期待“一部體現最新成果、充滿新鮮材料、既翔實可靠又盡力避免因臆斷而誤著的清代戲曲書錄及早問世”（《兼談》）。而他在《試談》中就已經相當清晰地提出編纂構想。一部理想的“清代戲曲書錄”呼之欲出。

其實，長風於1994年3月29日寫成《兼談》後，就已著手編

撰這種書錄。現在擺在我眼前的是長風的一部手稿，這雖是一部未完成的遺稿，但其中對清代曲家的統計已十分周詳可靠，其研究亦已趨於綜合化系統化。他的總結性的《清代戲曲家綜表》寫於1996年7月11日，此後又作多次修改。他的手稿邊上有好幾則按語。說明他於1996年8月、10月、11月、12月、1997年1月都在不停地修改，而定稿於1998年11月，其最後一則按語云：“本表直至1997年10月以前，一直在進行增補調整；停頓一年以後，1998年11月24日—30日，經反復核對，終於定稿，凡得曲家880人。”這裏所說的“停頓一年”，正是他因臥病而中止了這部系統著作的撰寫。

他的最後一篇論文《〈傳奇彙考〉探微》乃是抱病而成的。論文在臺灣《漢學研究》第十七卷第一期發表。刊物於1999年6月份出版，而長風已於三個月前病逝。在論文末尾的附語中，長風告訴我們，他是在《考略三編》截稿後深入探索《傳奇彙考》的，不料於1997年11月中旬開始生病，他在“以文代藥、與病魔相抗爭的信念驅使下”開始了本文的寫作。至1998年1月底在接受了一個手術，而醫生宣佈必須再度施行手術時，他“一邊繼續地求醫問診，做各種必要的術前檢查和化驗，一邊忍受著病痛、重新鼓起幾乎已經銷融殆盡的信心，重新出發，終於趕在3月初的手術之前完成了本文”。我非常仔細地捧讀了這篇論文，這一篇二萬多字的考證文章，可以說是長風一生中最好的論文之一。他真有“課虛無以責有”的手段，在一堆看似無關的材料中，竟然能考證出《傳奇彙考》的作者是明末清初的戲曲家來集之。由於他的冥搜幽討之功，大大推進了對《傳奇彙考》這一部充滿問號的奇書的認識。但誰能想像，這樣一篇精彩之論，是作者與病魔作數月的周旋抗爭中寫成的。

1998年8月底，長風終於看完了《考略三編》的校樣，他在

《校後記》中寫道：“自去冬以來，二豎爲逆，既久且烈，苦痛逾常；幸有內子陪侍在側，夙興夜寐，照拂一切，始得避凶趨吉、化險爲夷。”但是，他的生命還是未能真的“化險爲夷”。他在上個世紀末的那個乍暖還寒時節，在遙遠的異國他鄉，孤獨無援地離開了人間。

但是，他的生命在他的筆下銘刻著並永生著。誠如他自己所言：“讀書、研究和百萬字讀書劄記的撰寫，耗去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同時，這三本集子也忠實地記載了我生命歷程的一部分，並且已經成爲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將會加倍珍惜這一段曾經屬於我自己的生命。”（《考略三編·後記》）

如今，他離開我們已經整整十年了。我可以告慰逝者，你的這一段生命，滋養了許多讀者的學術之靈，愈益顯得珍貴無比。你的書，始終安放在我的案頭。

葉長海

2009年2月17日深夜

於上海周橋

序

有人稱古典戲曲的研究爲“顯學”，這自然是有根據的。如果變換一個角度，稱之爲“晦學”，也未嘗不可。試看，詩、文、詞、曲雖在同一個層面上，但傳統的負荷太重了，經常發生傾斜，人們心目中曲的價值可上可下，並不那麼穩定；就史的一面看，許多戲曲資料深藏不露，尚待開掘，或者說，文獻研究工作的開展不太平衡，與近、現代銜接最緊的明、清戲曲，清理工作似乎剛剛起步。因此，戲曲研究要開新生面，那是好的，但由於缺乏堅實的基礎，這種研究多少要受些影響。

這兩方面的問題確乎存在：

比如，清初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吳梅村，大家是熟悉的，但說梅村又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戲曲家，知道的人就要打折扣。吳氏深諳戲曲的妙用，相傳他教學生，每當學生文思滯澀，就不要求他們硬寫，而是叫他們盡量放鬆地去看戲。無怪他的學生往往是詩人兼戲曲家：“太倉十子”之一的王抃作有《籌邊樓》等傳奇（合稱《巢松樂府》），沈受宏有《海烈婦》傳奇，黃祖顯有《迎天榜》傳奇，幾乎形成了“太倉派”，這難道是偶然的嗎？搞清楚這方面的情况，至少在描述吳梅村時能多一點神似。

要研究繁富龐雜的明清戲曲，我們首先會想到工具書。清儒有言：“不通漢《藝文志》，不可以讀天下書。”這句過頭話，無非提醒人們重視做學問的入門書。一部完整實用的曲目簿錄，一定具有收縮和開拓兩種性能。收縮，是盡量吸取前人研究的成果；

2 明清戲曲家考略

開拓，又有編著者自己的創見心得。這樣的書太少了。究其原因，是一些應該做的事還沒來得及做。許多作品存佚不明，即使有存本，也因未見著錄，欲讀無門，連最起碼的情節內容也說不清，許多曲家生平不詳，就更談不上精確的生卒年的記錄了。但這是基礎工程，無法迴避，何況前人已經開了個頭。

當然，從事這樣的基礎工作很辛苦，也很寂寞。爬羅剔抉，鑽古紙堆，而且花大力氣未必有大收穫。這裏，需要的是鍥而不舍的精神，珍惜點點滴滴的積累。甘之如飴地去坐“冷板凳”，這樣的人不會太多，鄧長風先生就是少數者之一，他的《明清戲曲家考略》是一項研究明清戲曲的基礎工程，凡是同道，自能感受到它的份量。

我好談清代劇事，對於明清易代之際的戲曲活動也很感興趣。長風去國之前，常來寒舍小坐，有時談曲，主題總落在明清戲曲作家作品的考辨上。他喜歡拿證據說話，務實不尚虛；還有，認真，一條資料，反復驗證，一絲不苟。旅美以後，暇餘不廢治學，讀書更加精勤，幾乎把可能擠出來的時間都“泡”在美國國會圖書館了。每次來信，總是談他的“新發現”，如何的“狂喜”，我想正是這最純淨的快樂，使他在短短幾年裏，寫成了“讀書札記”十五篇，加上性質相近的舊作，足有四十多萬言，成績十分可觀。

《考略》的中心內容並不是一般的作家論，而是着重在明清戲曲家生平和生卒年的考訂。像許自昌、鄭若庸、卓人月、陳二白、徐沁、周稚廉、吳震生、曹錫輔等，都是明清兩代相當重要的曲家，但他們又沒有湯顯祖、洪昇、孔尚任那樣烜赫的聲名。湯、洪、孔，研究的人集中，不斷地問難質疑，事物的透明度就高。許自昌等人則不然，重要但并不聲名烜赫，曲目專書以及有關辭書、論文在介紹他們時，大多沿用第二手的現成材料，人云亦云，

以訛傳訛，籠罩在這些曲家身上的迷霧，遲遲不散。作者的考訂，做的就是驅散迷霧的工作，使我們開始讀到新鮮的材料，呼吸到新鮮的空氣。例如《香草吟》和《載花鈴》的作者徐沁，拈出徐沁主名的，是嚴敦易先生，這已經是半個世紀以前的事了。以後時有討論，沒有什麼大的突破和進展，原因是提供不出關鍵性的資料。《考略》從切實的資料鉤沉工作着手，終於找到了王澐的《桐川詩鈔》和《康熙山陰縣志》，然後才來訂正，如同驪珠在握，作家生卒年明確，生平清楚，徐沁這個人就是“立體”的了。

聲名烜赫的大作家，在戲曲史上佔有相當重要地位的作家，兩者加起來，仍屬少數。大多數的明清曲家，一直被冷落着。個別地來看，說他重要性不夠，可以；但誰也無法否認，他們是明清戲曲整體的組成部份，不摸清他們的情況，整體的面貌也將是模糊的。作者正是從這點出發，對“大多數”下了一番清理功夫。《考略》中“讀書札記”從十一至十五，加上不列入“讀書札記”的《七位明清上海戲曲作家生平鉤沉》、《五位明清上海戲曲作家的生平及其著作》和《十五位明清戲曲作家的生平史料》三文，涉及的曲家已近八十位，或考訂其生卒年，或是從無到有的史料鉤沉，或提供新的生平資料，一一歸入適當的歷史階段，有助於對戲曲活動的整體考察。如果有人編新曲目，看到這些成果，將會如何的驚喜！

戲曲學各個門類的研究都應有它的獨立性。早期，一般曲家常依附於戲曲作品，即是在介紹作品時就刊本提供的資料範圍附帶介紹一下而已，其局限性顯而易見。《考略》完全把曲家研究看成一個獨立門類，這樣，視野開闊了，取材的面也大為拓寬，詩文集、筆記以至家譜、方志都可為我所用。作者在資料搜掘上思維非常活躍，從暗中摸索到左右逢源，調動了試探、旁求、

聯想、反證種種方法，相當成功。他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發現了康熙鈔本《雙冠誥》，寫成《康熙鈔本〈雙冠誥〉及其作者陳二白》一文。這個本子，國內未見，其重要性並不限於一部《雙冠誥》，還讓我們認識了戲曲創作與舞臺演出的關係，看到了靜（作者文學本）和動（臺本的演變）兩方面怎樣推動戲曲發展的過程。此外，副產品也很可喜，鈔本之末有一行題記，正好借以確定陳二白的生年和劇本創作的年代（當然，“頑皮老兒”是否即陳二白，會有不同的看法），帶來了意外的收獲。

《考略》僅初發端，繼此以往，當有《續考》、《三考》。當然考訂是一項寂寞的工作，然而也是一項有意義的工作。長風大可賈其餘勇，更上一層樓，不知以為然否？

陸 萼 庭

1993年8月